

向警予與中共早期婦女運動

許文堂*

- 一、前 言
- 二、家世與青少年時期的教育
- 三、赴法時期
- 四、加入共產黨
- 五、工運、婦運為革命
- 六、大波瀾
- 七、回國與被捕
- 八、結 語

一、前言

向警予是中共建黨初期的重要婦女運動領袖，與中國二十年代婦女運動有極密切關聯。其短暫的一生不管在中共黨史研究或婦女運動研究，甚至其他多種範疇，均具特殊意義。因此，和向警予研究有關的文章數量也極為眾多，惟其所呈現的面貌是近乎刻板的一致性。^①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① 主要有蔡和森的〈向警予同志傳〉作于 1928 年 7 月收在多種文集中。李明（即李立

長期以來，向警予在中共官方所塑造的是享有特殊地位的婦女運動先驅及英烈形象。^②但是，其中仍存在若干資料的不足與尚待澄清的疑點，其中包括向警予本身的資料與中共建黨初期對婦女運動的政策。資料不足與誤會加上政治性的型塑過程即產生若干迷思（myth），這種集體想像的虛構故事妨礙了歷史真象的探討，這是本文所企圖在資料方面補強與詮釋的。

二、家世與青少年時期的教育

向警予，湖南漵浦人，^③生於一八九五年九月四日，同胞十人中排行第九，故而乳名九九。^④其父向瑞齡為殷實商家，曾任漵浦商會會長，尤其注重教育，故而向家有兄弟四人留學日本，向警予亦在一九〇三年進入新式小學，學名俊賢。^⑤一九一一年，向俊賢考入常德女子師範，此時，向即有男女平權思想，並立志以教育救國。^⑥次年，轉入長沙之湖南第一女子師範

三）〈悼向警予同志〉（《湖南革命烈士傳》，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編，長沙，1952，頁32-36）。《烈士向警予》（北京：中國婦女雜誌社，1958）。《紀念向警予同志英勇就義五十周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戴緒恭，《向警予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谷茨，〈向警予〉，（《中共黨史人物傳》第六卷，西安：人民出版社，1982，頁58-90）。方徨、張葳，〈向警予〉（《革命烈士傳》第二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頁309-316）。

② 基本上，自中共六大之後即對向警予的評價定下基調。蔡和森之〈向警予同志傳〉即是承中共中央局之命而作。此後不斷強化其婦運先驅與烈士形象。1939年3月8日婦女節，毛澤東在延安即呼籲婦女學習「模範婦女領袖」向警予。周恩來亦稱向為第一任中央婦女部部長，英勇為革命犧牲，大家不要忘了她。1949年以後各種編纂之烈士傳不斷重複強化其樣板形象，儘管「文革」時期，有紅衛兵對向家抄查材料，但並未對其地位有所動搖，這不僅是向與建黨初期多位元老擁有良好關係，而且是基於政策需要之故。

③ 根據調查，漵浦向姓為土家族人，即以獨特婦女文字「女書」聞名之土著。見谷茨，〈向警予〉（中共黨史人物傳，第六卷，頁58），但向家早已漢化，故其族群分類並無顯著意義。

④ 戴緒恭，〈向警予傳〉，頁1-2。

⑤ 前引書，頁4。

⑥ 向與同學蔣勝眉（丁玲之母）、胡善倫、金紫敏、許友蓮、唐婉芬、翦萬容（翦伯贊之姑）結為七姊妹，誓詞曰：「姊妹七人誓同心願，振奮女子志氣，勵志讀書，男女

。向認真進德修業，頗得師友喜愛，曾任樂群會會長，道德部、學藝部長。^⑦教師楊昌濟曾譽向與陶毅（斯咏）任培道（仲瑜）為「女生三賢」，認為向乃「女教育界中之人材」。^⑧一九一四年秋，省立第一女師校長朱劍凡因遭當局之忌，去職，轉往周南女校。向與同學數人遂轉學周南女校師範班。^⑨一九一六年夏，向警予自周南女校畢業，返鄉激浦辦學。因其父為縣商會會長，同學吳家瑛之叔吳劍佩為縣知事，故而激浦女學得以順利成立，向任校長，同學吳家瑛、熊叔彬、范新群、任培道等人均前往任教。^⑩此一時期向警予和同儕一起傳授新知，反對封建惡習，甚至帶領女學生上街勞動，為「教育救國」的目標而奮鬥。從她為激浦女校所作之校歌亦可見其對新式婦女教育的期望。詞曰：「美哉！盧峰之下激水濱，我校巍巍矗立賞其前。看，我們姊妹一堂，相親相愛。現在已是男女平等，天然淘汰，觸目驚心！願同學作好準備，為我女界呵，大放光明。」^⑪其實，男女當然尚未平等，向警予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刺激下，希望經由教育爭得女界平等地位的志願更加堅定。

一九一八年四月，蔡和森、毛澤東、蕭瑜等湖南一師同學成立「新民學會」，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⑫其時正逢李石曾、蔡元培等人提倡赴法勤工儉學，主張青年赴法接受「正當教育」，以為改造中國社會的基礎。以勤工儉學之方式更可彌補民初學校普遍不足之弊，

平等，圖強獲勝，以達教育救國之目的。」《向警予文集》，頁 5。

- ⑦ 白瑜，〈向警予楊開慧的側面觀〉（臺北，《傳記文學》，卷 35，期 2，頁 64–67。）
- ⑧ 同上。楊昌濟（懷中）（1870~1920）曾留學日本、英國，當時任教湖南一師。楊昌濟，〈達化齋日記〉（長沙：人民，1978），頁 29，5 月 13 日條。據楊氏的瞭解，向特別注意蒙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 1870~1952）教學法。美國至第二次大戰後，始推廣此一啟蒙教學法。
- ⑨ 周南女校原即朱劍凡（周宗純）於 1905 年所創辦，1910 年開辦女子師範班，並有中學、小學各班，為當時長沙名校之一。張朋園，〈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南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頁 185–188。
- ⑩ 見〈請吳知事籌款書〉等文，收《向警予文集》，頁 263–276。
- ⑪ 〈激浦縣立女校校歌〉，收《向警予文集》，頁 287。
- ⑫ 〈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一號，《新民學會資料》（北京：人民，1980），頁 1–14。

以最省之費用工讀於海外，造就大批有用青年。^⑬六月間，新民學會推派蔡和森赴北京與李石曾商洽赴法預備學校各項事宜，隨即招來大批湖南同鄉準備赴法勤工儉學。^⑭同年底，向警予為逃避駐在瀘浦的湘西鎮守副使兼第五區司令周則范之提親而前往北京。^⑮爭取婚姻自主權極可能也是促成向警予參加赴法勤工儉學的原因之一。

一九一九年十月，向警予與蔡咸熙等發起「湖南女子留法勤工儉學會」，信奉「工讀神聖」，以「赴法勤工儉學，將來回國振興實業教育鵠的」。^⑯鼓動湖南女生赴法之風氣，故而湘省女生為各省赴法勤工儉學之冠。連蔡和森年近五旬之母葛健豪（蘭英）亦毅然赴法實行居家儉學，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

此一時期的向警予，由於家庭開明及所受教育與師友之影響，自少年時期即確立男女平等之女權思想，而懷抱教育救國的夢想。而赴法後，女權思想得到進一步的加強，教育救國的夢想卻打破了。

三、赴法時期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五十名勤工儉學生自上海搭乘法國郵輪Andé Lebon 號啓程赴法。其中有向警予、葛健豪、蔡暢、李志新、熊季光、蕭淑良等六名湖南女生。^⑰經歷四十天行程，向、蔡等人抵達巴黎，由

^⑬ 有關勤工儉學教育運動，參閱陳三井，《勤工儉學的發展》（臺北：東大圖書，1988）。

許文堂，〈李煜瀛與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收《近代中國歷史人物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頁175–198。

^⑭ 〈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一號。

陳三井，〈新民學會之成立及其在法活動〉，《勤工儉學的發展》，頁35–36。

^⑮ 戴緒恭，〈向警予傳〉，頁35–36。

^⑯ 蔡咸熙即蔡暢，為蔡和森之妹。有關湖南女子留法勤工儉學會，參見張允侯編《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頁190–202。

^⑰ 向等人並非第一批赴法的湘省女生，稍早，12月9日即有向之同學范新群、范新順、熊淑彬等人赴法。清華大學中共黨史教研組編《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北京出版社，1980）第二冊上，頁111。

華法教育會分往蒙達爾磯（Montargis）入學就讀，實行儉學生活。^⑯ 並無任何證據顯示，向曾在法國實行工讀。至少，渠在蒙達爾磯女子中學的學費應是由華法教育會代付至一九二一年九月間。距向返國僅三個月的空檔，此時向已有孕在身，且蒙達爾磯女校諸生亦有參議員夫人 Madame Hugue Le Roux 及鄭毓秀等人募集之助學金，故而留法儉學並非其從事婦運的經驗來源。^⑰

在赴法之前，蔡和森即對同儕宣稱：「往京考公費學校乃隨俗的迷夢也，于吾輩并無甚麼必要。往西洋進大學亦隨俗的迷夢也，于吾輩并無甚麼必要。必要只在通其語文，悉其種種之真象耳。」^⑱ 抵法之後，「新民學會」的各會員進行分工研究社會問題，其中向警予和熊季光負責閱讀法文〈婦女聲報〉、〈女權報〉及其他小冊，主要為考察婦女運動。^⑲ 在法「新民學會」會員的此次大會最主要的影響是確立學會今後的方針為「改造中國與世界」。至於其方法，蔡和森提出「組織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的俄式革命。此點得到毛澤東的贊同，但仍有其他會員如蕭旭東、李維漢持反對意見。^⑳ 由於蔡和森轉變為馬列共產主義者，向警予在其影響之下似乎也拋棄「教育救國」的理想，轉而信仰共產主義，^㉑ 協助蔡和森組織所謂「無產階級先

^⑯ 蔡和森在華法教育會之註冊號碼為 731。葛健豪 732，向警予 733，熊季光 734，李志新 735。均注明由華法教育會代付學費。法國外交部檔案（AE）E-Asie-Chine.27/4.

^⑰ 向在法國時曾入橡膠廠、紡織廠工作之依據主要為李立三、蔡暢等人之回憶，而為多人採用。

^⑱ 《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1980），頁 13、22。

^㉑ 〈蕭旭東給毛澤東〉，收中國革命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編，《新民學會資料》（北京：人民，1980），頁 133–143。本信為「新民學會」在法會員在 1920 年 7 月 6 日至 7 月 10 日在 Montargis 集會討論的實況紀錄。蕭瑜在信中直稱「向女士真好！」

^㉒ 同上。〈李維漢給毛澤東〉，前引書，頁 143–144。信中有「學會中諸女友都比我們強」之句。

^㉓ 蔡和森，〈向警予同志傳〉中稱向之轉變是在同船赴法期間，「這是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五日在印度洋船中的事情」。然而向警予所撰〈女子解放與改造的商榷〉一文，作于 1920 年 5 月 26 日，發表于《少年中國》1920 年 8 月 15 日，卷 2 期 2，其中仍表達「將來社會的經濟能否實行共產，固尚有待于研究」的保留。〈向警予給彭璜、毛澤東〉6 月 2 日的信中則稱：「自出激來，黨從前總之皆錯誤」，《新民學會資料》，頁 75。

鋒隊」的共產黨。²²向警予和蔡和森在一九二〇年五月間以自由戀愛而結合，據知他們的結婚公啟是新詩形式《向上宣言》的小冊子，結婚照為兩人同捧馬克思的《資本論》，象徵共同信仰的基礎。²³這種「婚禮」在「五四」青年中也頗見「新意」，甚至引得毛澤東想「奉向蔡做首領，組成一個“拒婚同盟”」。²⁴的確，此時向警予不僅衝決舊傳統的婚姻網羅，向其父母宣告「我同他是一千九百廿年產生的新人」，而她更要衝決一切束縛「努力做人，努力向上」，「要在這世上放一個特別光明」。²⁵

法國戰後的經濟復甦情況並不如原先想像中的樂觀，到處是破產的工廠和大批復員的失業勞動者。這種情況使「華法教育會」窮於安排一批又一批到法的勤工儉學生。到一九二〇年末，一千五百名勤工儉學生之中，約只五百人得以入廠勤工，約五百名入校儉學，而另外占三分之一的五百之眾則工、學兩難，坐待救濟。²⁶尤其至一九二一年一月中，「華法教育會」發出通告，宣布與勤工儉學生脫離經濟關係，所有的津貼或借款一律發放至二月底為止。²⁷如此一來，留法勤工儉學生大起恐慌，群集會商解救之道，而此時北京政府教育部復電駐法公使商量資遣勤工儉學生返國之法，遂使部分學生決議向政府要求將遣送之費改作求學生活津貼。²⁸尤其蒙達爾磯的學生提出爭取「生存權」、「求學權」、「工作權」的口號，主張前往駐法公使館進行請願，要求政府發給每人每月四百法郎的津貼，以四年為限。²⁹其中向警予更是留法女生的代表，她的演講被認為極具鼓動性。

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晨，四、五百名勤工儉學生群集巴黎中國公使館附近的公園，並推派代表十一人前往會見公使陳籩，向警予為其中唯一的

²² 〈蔡林彬給毛澤東〉，收《新民學會資料》，頁128-133。

²³ 劉昂，〈回憶敬愛的向警予同志〉，收《紀念向警予同志英勇就義五十周年》（北京：人民，1978），頁6-22。

²⁴ 〈毛澤東給羅學瓊〉，《新民學會資料》，頁119-121。

²⁵ 《向警予文集》，頁278。

²⁶ 法國國家檔案館（AN）47AS-1，A/2-1。

²⁷ 〈巴黎華法教育會通告〉，收張允侯等編《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頁762-763。

²⁸ 〈教育部電駐法使館酌量資送勤工儉學生回國〉，收前書，頁796。

²⁹ 〈勤工儉學生問題近訊〉，《旅歐周刊》第六十九號，1921年3月5日。

女生代表。^⑫公使陳籛無法答應請願代表之要求，代表不願離開使館，聚集之學生復不肯散去。在此情況下，陳籛只得出見學生並發表聲明企圖規勸，以緩事態。不料學生喊打，陳籛只求在警察保護下狼狽逃出，一旁守候的警察也出面將集會解散。留在公使館內的學生代表們執意不肯離去，陳籛遂召法警將他們驅逐離館。代表們被押至警局作筆錄，並遭留置一夜。^⑬這是向警予、蔡和森首次推動群眾運動，也因此遭受首度牢獄之災。

此次的「二八請願」運動雖然失敗，但也迫使各界正視勤工儉學運動的困境。中法雙方成立一個「中國少年監護委員會」，對生活無著之勤工儉學生發放每日五法郎之救濟金。^⑭未幾，傳來有關由吳稚暉倡議的「海外大學」即將在里昂（Lyon）成立的消息，向警予即在五月中連絡在法女生，組成「開放海外大學女子請願團」，並向各界發出公啓，要求該大學對女生入學名額應予平等或不加限制；免除考試，程度不足者設補習班；津貼學費。向警予認為這些要求「並非以特權專利階級自居」，相反地，「女子既無財產權，家庭、社會之地位均不如男子」，教育機會之不平等「實社會制度所致」，故而「海外大學解放運動實為女子教育平等運動之發端，亦極重要之社會運動也。」^⑮向警予不僅說明女權不張的根源，並將（女性）教育與社會制度改造聯絡在一起，顯示其進一步的革命傾向。甚至，此次要求女子教育平等運動的發端也成為九月下旬「進佔里大」事件的前奏。

對於「里昂中法大學」（即海外大學）的設立滿懷希望的勤工儉學生在獲知入學無望，而「監護委員會」之津貼又將中斷的消息，遂由各地代表組成「先鋒隊」於九月二十一日進佔里昂中法大學校舍。這批代表為法國當局拘留，並於十月十四日遣返中國，其中包括蔡和森、李立三、陳毅等人。^⑯向警予此時已有身孕，復無學費，故於十一月肩負為留法女生請命的任務啓

^⑫ 法國國家檔案局，海外部檔，A.N. SLOTFOM VIII -6. 向警予之拼音為 Hian King Yee.

^⑬ 同上。法國警方認為蔡和森是「危險人物」，建議應予密切注意。

^⑭ A.N. 47AS1, A/2-2，有關接受救濟學生名單及款項。

^⑮ 〈留法女生對海外大學之要求〉，收《向警予文集》，頁 29-34。

^⑯ 〈歸國勤工儉學生之調查〉，收清華大學中共黨史教研組編《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第二冊，下集，頁 620-623。

程返國。除在新加坡募款外，向警予回國後亦四方奔走，經熊希齡、李石曾等人之助，在法的四十名勤工儉學女生獲得一筆助學津貼。^⑦

四、加入共產黨

蔡和森在返國之後經由陳公培之介紹，會見陳獨秀，于一九二一年底正式加入共產黨，並留在上海工作，稍後返國的向警予亦在上海加入共產黨，參加組織工作。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向警予為十二名代表之一，並在此次大會當選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出任新設立之婦女部部長。^⑧事實上，中共之所以設立婦女部完全是秉承第三國際之意旨。一九二一年七月，第三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通過〈共產黨對婦女進行工作的方法〉提綱。此一提綱中決議「各國共產黨于他們的組織之旁設立特別委員會，以宣傳廣大的婦女群眾，并令在各國創立一婦女部，各國共產黨的機關報中，亦須為婦女特闢一欄。」^⑨這次決議案實際上並無特殊意義，僅總結第三國際的前述提綱，並以俄國婦女在大革命之後所獲得的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的平等權利作為婦女解放必須在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實現的論證。換言之，中共認為「婦女解放是要伴著勞動解放進行的，只有無產階級獲得了政權，婦女們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⑩這種將女權運動附屬於勞動運動的意識主導了早期中共婦女運動的路線、也規範了向警予在婦女運動的發展方向。

婦女運動推動不易，而勞工婦女運動豈為易事？綜觀一九二二年全年至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為止的此段時期，向警予似乎並無

^⑦ 〈致熊希齡信〉、〈致朱淑雅信〉，收《向警予文集》，頁35-39。朱淑雅為熊希齡之夫人。

^⑧ 蔡暢、戴緒恭，均認為向當選中央委員。惟劉金田、沈學明編《歷屆中共中央委員人名詞典》（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頁1。陳至立編《中國共產黨建設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頁54。向警予均無列名第二屆中央委員名單，僅為候補委員。

^⑨ 〈關於婦女運動的決議〉，收時光等編《二大和三大》（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85），頁83-85。

^⑩ 同上。

明顯參與婦女運動的推動。如果《嚮導》周報上署名「振宇」的二十餘篇文章確實出自向警予的手筆，^⑩則均為一般性之時事評論，並不及於婦女運動，況且筆名與作者尚存若干疑義，^⑪故而，這一段時期的「婦女部部長」工作實在難以評估。

另一方面，由「中華女界聯合會」創辦的《婦女聲》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在上海出刊。其中編輯與作者不乏共產黨人如李達、王劍虹、王會悟、沈澤民、沈雁冰、邵力子等人，內容多為宣傳婦女解放思想、鼓吹無產階級革命。惟該刊發行至一九二二年六月即告停刊。^⑫同時期的上海《民國日報》副刊〈婦女評論〉每周出版一期，主要登載有關婦女運動，尤其強調「婦女勞運階級革命尤其是婦女（革命）方面中心的中心。」^⑬在此二份主要鼓吹女權運動的刊物中均尚未見到向警予的活動。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此次大會中，向警予並未能當選中央委員，亦非候補中委，但仍保留婦女部部長之職。^⑭在四百二十名黨員中，女性黨員僅有三十七名，占中共黨員數僅百分之九，顯然在中央權力結構中並未占一席之地。對於將勞動運動與婦女運動結合進行的困境，在「二大」以來婦女部的毫無作為可以顯現出來。據信是出自向警予之手的「三大」《婦女運動決議案》也反映出難處：勞動婦女運動中，男工輕視女工的情況嚴重，尤其在一般的婦女運動中「宜注意：第一，不要輕視此等為小姐、太太，或女政客們的運動；第二，階級的主義的色彩不要太驟太濃，至使她們望而生畏。」^⑮

^⑩ 戴緒恭、姚維斗，〈「振宇」為向警予筆名考〉，載《近代史研究》期 2（北京，1982），頁 313-318。

^⑪ 仁木富美子，〈「振宇」是向警予的筆名嗎？〉，載《近代史研究》期 6（北京，1986），頁 291-300。

^⑫ 《婦女聲》參考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北京：三聯書店，1979）第二集，上冊，頁 201-212。下冊，頁 702-704。

^⑬ 沈澤民，〈中國青年女子底煩悶〉，載《婦女評論》1922 年 1 月 1 日增刊。同上書，上冊，頁 213-221。下冊，頁 705-734。

^⑭ 陳至立編《中國共產黨建設史》（上海：人民，1991），頁 71。戴緒恭，《向警予傳》，頁 84。稱向警予獲選為中委不知何所據。

^⑮ 〈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收《二大和三大》，頁 168-173。〈婦女運動決議案〉，收《二大和三大》，頁 90-91。

這個決議案顯現了較大的妥協性或策略性，因為它事實上違背了第三國際在第三次全代會通過的〈共產黨對婦女進行工作的方法提綱〉中所提不要同資產階級的男女平權論者合作和妥協，不依靠各階級婦女聯合努力爭取勝利的訓令。^⑭相反地，中共三大《婦女運動決議案》是為國共合作下的婦女運動鋪路，提出「全國婦女運動的大聯合」的口號。

〈中國最近婦女運動〉一文應可視為向警予出任婦女部部長一年來為出席中共「三大」所作的總結報告。文中向警予將婦女運動區分為勞動婦女運動，女權及參政運動，基督教婦女運動三派。其中勞動婦女運動計發動罷工十八次，然而共產黨並未參與其間。女權及參政運動在北京、上海、天津、長沙、廣州等地成立若干團體也取得一些成績，但是向認為這些小姐、太太們是軟弱的寄生蟲，只想做無聊的議員或可恥的官僚。比較有實際活動的基督教婦女團體對勞動婦女「不遺餘力的幫助」，她們能深入群眾固然得力於組織上、方法上、技術上、人才上、經濟上無一不有國際後援，但是向警予懷疑這些團體會成為帝國主義者的工具，「而不是中國國民革命中需要之獨立婦女運動。」^⑮這篇文章似乎透露出向警予在感情與理智上對「三大」的《婦女運動決議案》的妥協策略有所矛盾。但國共合作路線的形成和工運的新形勢都需要向警予的犧牲奉獻。

五、工運、婦運為革命

回到上海，向警予首先參與一九二三年九月的絲廠女工罷工。由於抗議工時延長、工資縮減的待遇，部份絲廠女工展開罷工鬥爭。向警予除鼓吹女工團結合作，加入工會組織之外，並呼籲其他婦女團體注意勞動婦女問題，企圖將工運與婦運結合在一起，從而引導占國民半數的女子參加國民革命運動。^⑯

^⑭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文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頁1084-1088。

^⑮ 警予〈中國最近婦女運動〉，載《前鋒》第1期，1923年7月1日，亦見《民國日報》之〈婦女評論〉第101期，1923年7月25日。

^⑯ 向警予在1923年下半年的文章基本上圍繞此一主題。參閱《向警予文集》，頁110-

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建立聯合戰線。改組後的國民黨中央婦女部部長先後由曾醒、廖冰筠、何香凝擔任，幹事之中則有中共黨員蔡暢、高恬波。⁵⁰另外在上海、北京、漢口均設立婦女部，上海執行部由葉楚倫兼任青年婦女部長，向警予為助理。⁵¹四月，在向警予主導之下，上海「婦女運動委員會」成立，其宣言稱：「中國女權運動其理想標準不僅僅在於得到一般中國男子平等的地位，而是一面要求法律上、經濟上、教育上、社會上的男女平等，一面熱烈的參加一般民眾打倒列強和北洋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以免除中國民族內外的壓迫，以實現國民黨政綱中關於確認男女平等的原則，助進女權發展的規定。」⁵²

據稱，向警予參與領導一九二四年六月中爆發的上海絲廠女工罷工運動，⁵³然而，向警予甫於五月二十五日在長沙生產，此時是否能積極參與罷工尚成疑問。⁵⁴在九月發生的南洋兄弟煙草工廠罷工運動確是得到上海「婦女運動委員會」及各界的後援，達到工運與婦運結合的革命目標。向警予在此次事件中私下表達了對統一戰線的不滿，譴責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不作為」是對國民黨宣言擁護工人利益的叛逆。⁵⁵但是策略上向警予盡力維持聯合戰線，以利婦女運動及革命的推行。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孫中山發表「北上宣言」，主張召開國民會議，十七日過滬時向警予等全體女黨員均參加歡迎大會。此後向積極發起「女界國民會議促進會」，並且促成全國女界國民會議促進會成立。向警予掌握「婦女運動必須乘著國民運動的長風，才有日進萬里的可能」，喚醒部分婦

156。

⁵⁰ 游鑑明，〈中國國民黨改組後的婦女運動〉，載師大《歷史學報》，（1990年6月，第十八期），頁345。

⁵¹ 〈向警予年表〉，收錄於《向警予文集》，頁302。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中共上海黨史大事記（1919～1949）》（上海，知識出版社，1989），頁59。

⁵² 《時報》，1924年4月1日。

⁵³ 《向警予傳》，頁94—95。戴緒恭將6月絲廠大罷工譽為自1923年2月京漢路大罷工以後再現之工運高潮。此次罷工自14日發生至27日解決。

⁵⁴ 〈向警予年表〉，前引文，頁303。

⁵⁵ 振宇，〈南洋煙草資本家打破罷工之惡辣手段〉，載《嚮導》，第85期，1924年10月1日。收《向警予文集》，頁174—176。既用筆名故稱之「私下」表態。

女群眾的覺悟，並時時呼籲「我們要完成婦女解放的使命，只有去找群眾，只有去找生活最痛苦、要求解放最迫切、而最富有解放精神與魄力的群眾，這種群眾方是我們婦女運動真正的基礎」。⁵⁶向警予眼光中的群眾基礎自然是下層工農婦女，因此她不忘提醒「名閨才媛」要為全體婦女爭普遍的權利、普遍的地位，而非為少數婦女爭特別權利、特別地位，婦女運動是要求婦女的自由平等，而在中國民族未達到自由平等以前，婦女絕不會單獨達到自由平等。⁵⁷

經過這次的女界國民會議運動使得婦女運動團體也達成聯合陣線，為參與國民革命打下群眾基礎。「五卅運動」爆發後婦女團體的動員即展現新氣象，尤其是勞動婦女的積極參與更顯示向警予在此方面耕耘的成果。

向警予在勞動婦女工作方面的推行主要是經由「平民夜校」招收女工及培養上海大學女生作為骨幹，並經常到工人聚居地區演說。⁵⁸上海地方並因中共婦女運動之日漸重要而成立地委婦女部，由楊之華擔任部長。

然而，中共中央對婦女運動似乎採取輕忽悲觀的矛盾態度。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在上海召開的「四大」，向警予不僅未獲選為中執委亦未列名候補，甚至中央婦女部自中央局取消。⁵⁹一方面要「各地黨部亟應設立婦女部，其無女黨員的地方亦應組織婦女部」，卻又認為「本黨婦女部在中國現在的政治狀況之下只能秘密存在」，所採取的策略是「凡國民黨可以公開或半公開的地方，本黨須設法使女黨員在該黨婦女部中工作，以便施展本黨婦女運動的計畫，其由本黨黨員主持之國民黨黨部其婦女部更應受本黨指揮」。⁶⁰由此看來儘管表裡不一，但一切運動都是在國民黨旗幟下進行

⁵⁶ 〈國民會議與婦女〉，〈婦女運動與國民運動〉，〈婦女運動的基礎〉，收《向警予文集》，頁179–185，186–188，204–205。

⁵⁷ 〈女國民大會的三大意義〉，《向警予文集》，頁198–201。〈在“中國婦女協會”成立會上的演說〉，頁218–219。

⁵⁸ 王一如，〈紀念向警予同志〉，收《紀念向警予同志英勇就義五十周年》，頁23–30。

戴緒恭，〈向警予傳〉，頁95–101。《上海婦女運動史（1919～1949）》（上海：人民，1990），頁98–100。

⁵⁹ 陳至立編《中國共產黨建設史》，頁90–91。向警予並未出席「四大」。方徨、張藏、戴緒恭等人則「任命」向為中委。

⁶⁰ 四大〈對於婦女運動之議決案〉，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一）（

。

六、大波瀾

向警予在湖南長沙第一女師就讀時在同儕間即有「聖人」之號，在法國與蔡和森的「向上同盟」復久為人所稱道，向蔡的模範形象在中共早期黨內著有聲名。其後的中共史家遂將之塑造成「革命」夫妻典型。然而這似乎未能解答為何向、蔡二人在革命情勢高漲前夕被派往莫斯科，直至一九二七年三月方才歸國，等等事件。

美國學者 Klein 和 Clark 似乎將向警予和彭述之的戀情作為向警予未能當選中委的原因，^⑩卻可作為鄭超麟的回憶的旁證。^⑪據鄭超麟之說法，一九二五年九月，由於向警予愛慕彭述之，蔡和森報請中共中央，即陳獨秀、瞿秋白、張國燦三人處理，黨中央遂派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李純一等人為參加共產國際第六次擴大全會代表團。一九二六年以後蔡和森與向警予分手，而與李一純結合。並因此戀愛事件引發一九二七年秋，蔡和森在北方局對順直省委書記彭述之的鬥爭，和「六大」以後，李立三對蔡和森的奪權

。

平心而論，向警予自然在其平日鼓吹的女權中覺悟自身追求幸福的自由與權利，不再受繩於舊禮教的人生觀。然而，黨意與對象均屬違旨逆意的狀況下，向警予又能何求？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三日，向警予在共產國際第六次全會第十八次會議上接受蘇聯沃龍涅什省婦女部代表獻旗，向作為上海及全中國女工代表致謝辭。^⑫大會過後，向警予至「東方勞動大學」進修，在俄國檔案中，其代名為 Nadezhina。^⑬至於向警予的詳細活動情況仍有待進

北京：中共中央黨校，1982），頁 302–303，310。

^⑩ Klein & Clark, *Biograph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Communism, 1921–196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317.

^⑪ 鄭超麟回憶錄第六章「戀愛與政治」——為愛情而鬥爭，載《開放》雜誌（香港，1991，2 月號），頁 81–85。鄭在上海時與向、蔡同住一樓，故其證詞當有可靠之處。

^⑫ 《向警予文集》，頁 233–234。

^⑬ Alexander Pantsov, "Chinese Students in Soviet Russia",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一步的研究。

七、回國與被捕

經過一年的沈潛，向警予在國共合作破裂前夕返國，一九二七年四月派赴漢口，負責組織工運活動。中共黨員人數由「四大」時的 994 人，隨著北伐的進展，至「五大」時激增至 57,967 人，其中女性黨員占 8.27%，即約 4,794 人，而中央委員會中女性成員則有楊之華，顯示向警予似乎遭到冷遇。^⑯武漢清共之後，中共成立「長江局」，由羅亦農任書記，向警予為湖北省委宣傳部地下刊物《大江》報之主筆，仍堅持工運工作。然而時勢極其不利任何群眾運動的發展，尤其武漢衛戍司令胡宗鐸上任以來，捕獲共黨之事日有所聞，處決共黨份子兩百餘人以上。^⑰一九二八年二月間，先是中共長江局在永貴里機關，望平里湖北省委機關遭破獲，陸續逮捕共黨多人，繼之三月二十日在漢口法租界三德里捕獲化名為易夏氏之向警予等人。^⑱司令胡宗鐸要求法方引渡，法國領事陸公德以向警予為國事犯乃租界管轄權，拒之。胡宗鐸憤而通電全國，號收回漢口法租界，並指法領陸公德收受共黨之賄，^⑲法方抗議無稽謠言，經新派駐漢口領事呂爾庚之折衝，終於答應引渡。^⑳四月十二日，向警予自法租界引渡，「沿途觀者人山人海」。^㉑胡宗鐸亦於四月二十日再度通電「仰體中央曲全之苦心，暫時結束，至收回法租界問題，應俟政府統籌辦理」。^㉒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4th November 1993) p. 13.

^⑯ 《歷屆中共中央委員人名詞典》，頁 2。
《中國共產黨建設史》，頁 118–123。

^⑰ 天津《大公報》，1928 年 3 月 25 日，4 月 5 日。

^⑱ 上海《民國日報》，1928 年 3 月 21 日，4 月 3 日，4 月 5 日。

^⑲ 上海《民國日報》，1928 年 4 月 3 日。

天津《大公報》，1928 年 4 月 9 日，10 日。

^㉑ 上海《民國日報》，1928 年 4 月 10 日。

天津《大公報》，1928 年 4 月 13 日。

^㉒ 上海《申報》，1928 年 4 月 14 日。

^㉓ 天津《大公報》，1928 年 4 月 24 日。

此次「庇共」或「引渡」之爭終以法方讓步收場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漢口、九江英租界在前一年即由「革命外交」手段收回，法使不願再生事端，以免喪失法租界；二、去年三月發生之「南京事件」正值賠償談判與續訂新約之時，法國公使復卸任在即，亟願儘速解決。

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晨，向警予犧牲於刑場。對於共產黨，她固然是英勇就義，成為黨史烈士。對於向警予個人，「明知不可而為」的視死如歸精神是否一種無奈的自棄？^⑫對於時代而言，澎湃洶湧的國民革命浪潮席捲多少青年，但是變幻莫測的政治海洋又吞噬多少青年以為犧牲？以和向警予大約同時受刑的湘省共黨份子為例：楊淑純，長沙人，第一師範女生，年十六歲，省委書記。馬志純，長沙人，建本中學女生，年十四歲，湖南省委婦女部長兼長沙市婦女部長。……綁赴刑場時「竟沿途跳躍，高呼口號不止，亦可謂慄不畏死矣」，^⑬實是時代的犧牲！

八、結語

向警予的死成就她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的歷史地位。而中共的婦女政策又如何？一九二八年七月召開的「六大」中，《婦女運動議決案》稱：「黨內在組織上，工作上有些取消主義的傾向，對於女工、農婦並未提拔她們參加指導機關，尤是證明黨之不注意婦女運動工作。」^⑭稍後的中共婦女政策也仍侷限在「動員」婦女作為「生產」、「運輸」、「救護」的動員，而非「運動」，遑論領導全國婦女運動。

將婦女運動附屬於政治運動或政治化的勞工運動，企圖「畢其功于一役」的作法，只是將婦女運動變質為「運動婦女」，往往其原有目標即為政治目的所取代，喪失女權的本體性。^⑮

^⑫ 白瑜，前引文，頁 65。白瑜為向警予昔日好友任培道之妹婿，向之好友吳家瑛謂其屢勸向放棄共黨，向云願以身殉，當非誣詞。

^⑬ 《申報》，1928 年 4 月 6 日。

^⑭ 《婦女運動議決案》，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四（1928），頁 431。

^⑮ 呂芳上，〈娜拉出走以後——五四到北伐青年婦女的活動〉，中國現代青年運動之發展學術討論會論文，頁 16。

本文無意討論民國初期之婦女運動團體的活動，或比較國共兩黨的婦女政策理論，僅經由人物研究指出若干事實。而這些事實與中共史家所塑造的婦女運動領袖向警予的形象，和中共注重婦女運動推動婦女政策的表象不盡相符。然而，錯誤資料的累積往往未經辨證而為歷史學者引用，達到推波助瀾的作用。^⑯

婦女運動的發展歷史過程雖有起伏曲折的階段性，但是仍脫離不了整個歷史的大環境，如果一味突出個人的關鍵作用，抹煞其他團體在各方面的努力，豈不陷入「英雄崇拜」的窠臼。

^⑯ Roxane Witke, “Woman as Politician in China of the 1920s”, in Young, Marilyn ed., *Women in China*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 of Michigan, 1973) pp.33–45. Suzette Leith, “Chinese Women in the Early Communist Movement”, in *Women in China*, op. cit. pp.47–71. Catherine Gipoulon, “Integrating the Feminist and Worker’s Movement: The Case of Xiang Jingyu”, in *Republican China* 10:1a (Nov.1984),pp.29–41. Marilyn Levine, An. “The Found Generation: Chinese Communism in Europe, 1919–1925”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6. Christina Gilmartin K. “Mobilizing Women: The Early Experienc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0–1927.” PH.D. 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86. Andrea McElderry “Woman Revolutionary: Xiang Jingyu” in *The China Quarterly* 105 (Mar. 1986), pp.95–122.